

非正规部门竞争、政治寻租与新创企业市场创新

王晓红, 胡士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市场创新是新创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然而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受到多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基于制度基础观,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均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治寻租未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非正规竞争导致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并非是引致新创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资金需求和躲避严苛繁琐的政府管制的需要是引诱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必过分担忧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的负面影响,而应通过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逐步消除非正规经济;要通过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消除企业寻租的动机。

关键词: 非正规部门;政治寻租;市场创新;新创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19)10-0104-08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创业大军,而新创企业也随之不断涌现。新创企业在促进就业和驱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它们也面临着低成长率及成长的巨大差异等问题,许多新创企业没有摆脱成长“陷阱”而夭折和消亡^[1]。以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创新是企业应对市场需求和提高经营收益的主要途径,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市场创新对新创企业的重要性可能更加重要,唯有进行市场创新,企业才能得以存活并不断成长。

制度基础观认为国家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体系对企业战略(如创新战略)具有深刻影响^[3],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从战略选择中获取的经济租的多寡^[4-5]。相较于发达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的制度体系仍不完善,突出体现是非正规部门竞争的存在^[6]和一些领域仍存在的严格的政府管制(如烦琐的行政审批和业务许可手续)^[5-6]。

非正规部门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5,7-8],尽管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研

究大多认为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非正规部门通过躲避管制,模仿、复制甚至剽窃技术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正规部门的生产和经营产生深刻影响,甚至被许多企业视为企业经营的重大障碍。由此我们不禁要问,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的创新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发现的其对成熟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否会有所差异?然而,尚未有研究对此作出实证解答。

另一方面,面临非正规部门的竞争和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严格的政府管制,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例如,新创企业)可能通过政治寻租以寻求政府庇护^[6,9-10],即通过享受政府在税收、许可证和管制方面的便利条件,同非正规部门进行竞争并力图在产品生产速度和生产成本方面实现平等,减少市场机制不完善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然而,政治寻租本身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原因在于寻租活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11]。截至目前,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具体影响尚未得到有效验证。

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问卷调

收稿日期:2019-09-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校企合作对中国高校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71874042);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806120222)

作者简介:王晓红(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与创新管理;(通讯作者)胡士磊(1988—),男,山东滨州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和校企合作。

查数据考察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创新性地非正规部门竞争与政治寻租整合到一个研究框架下,并在理论上系统探讨了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对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企业创新研究的理论边界;②首次将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对企业创新研究的对象锁定于新创企业,拓展了已有研究的研究视野;③考察了影响新创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因素,丰富了对企业寻租行为背后影响机制的理解和认识。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非正规部门竞争与新创企业市场创新

截止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非正规部门的概念形成统一认识,实践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此概念的界定也存在诸多差异^[5]。参考已有研究^[8,12]的定义,本文将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未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生产单元或在工商部门注册但隐瞒财务状况及明显存在逃避法律管制行为的企业”。

在非正规部门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持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部门竞争抑制企业创新。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非正规部门通过模仿、复制甚至抄袭正规企业的产品,凭借规避法律法规的“天然优势”销售价格低廉的同类替代品,与正规部门竞争顾客群体,快速稀释企业的创新利益,从而削弱企业的创新意愿,扭曲企业的创新决策^[5,7-8]。另一方面,非正规部门竞争会使得金融机构对正规企业的发展前景产生忧虑,从而降低其信用水平或提高其获取贷款的抵押准则,使企业面临财务约束问题,从而不利于企业的研发创新^[13-14]。另一种观点认为,面对非正规部门的竞争,正规企业可能选择强化研发投入,实现产品更新升级,从而使得自身产品在产品市场上区别于非正规部门的产品^[8]。最近的一系列研究^[15-16]支持了此观点,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的竞争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创新,而且新产品研发确实是区别于非正规部门的有效策略。相较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的产品通常没有稳定的市场细分和忠诚的顾客群体,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企业很可能也必须将创新资源集中于产品创新。而且,新创企业在尝试全新技术、商业模式和市场方面具有优势,受思维模式限制和组织路径依赖的影响很小^[17],因此,非正规部门竞争可能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2 政治寻租与新创企业市场创新

转型经济体中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近年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纵观现有研究,政治寻租对企业创新兼有抑制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6,18-19]。抑制论学者认为政治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当寻租带来的报酬足够大时,企业家可能将注意力更多地配置于非生产寻利活动而非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从而导致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和浪费,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利于企业的创新^[6,19]。而且,政治寻租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甚至挤出研发投入^[20]。促进论的学者认为政治寻租会通过两种渠道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其一是寻租有利于企业获得生产许可和业务授权,其二是寻租可为企业提供创新资金和政策牵引,如寻租可帮助企业获取政府的财政补贴、税负的减免及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6,18],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地方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寻租会替代市场机制,成为帮助政府甄别具有创新潜力企业的有效途径^[20]。新创企业参与政治寻租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严格政府管制的问题,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或提高审批速度,使企业尽快获得生产许可和业务授权,缩短企业新产品的上市周期,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倾向;另一方面,政治寻租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所需的创新资源,尤其是政府补贴等资源,从而助力企业的市场创新,且新创企业尚不会形成对寻租的依赖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3 政治寻租对非正规部门竞争与新创企业市场创新关系的影响

新创企业政治寻租也可能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企业市场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寻租简化了行政审批,使企业能够快速获得诸如商标和专利等无形资产,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而得以规避技术资产被窃取、创新成果被模仿、复制所导致的创新收益稀释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享受因创新成果的排他性占有而带来的收益^[6]。在此作用下,面对非正规部门的竞争压力,新创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勇气、更强的动力去增加研发投入,推出自己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政治寻租会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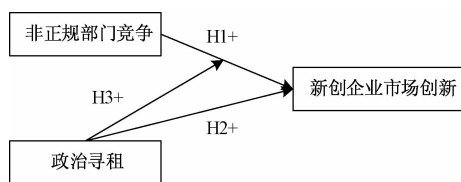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的概念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对中国 2700 家私营企业和 148 家国有企业开展的题为“China-Enterprise 2012”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了使数据分布更加均衡和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覆盖了北京、上海、大连、成都、深圳等中国 25 个城市,涉及食品、服装、音像制品、精密仪器及交通设备制造等 20 个行业。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多为总经理、总会计师等企业高层管理者,且多数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因而他们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对企业的了解程度优于其他受访对象,也保证了数据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提供了企业政治寻租和遭受非正规部门竞争情况的数据。由于调查人员来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企业在填答问卷时不会有大的心理包袱,加之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机制,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客观性^[6,8]。该数据被认为是目前在中国开展的为数不多的高质量调查数据之一,基于该数据的研究论文广泛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和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等中英文高水平期刊。

目前学者们对新创企业的界定有一定差异,大多数学者认为新创企业是生存年限在 8~10 年内的企业。参考已有研究^[21],本文将新创企业界定为生存年限小于等于 10 年的企业。在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收集到 554 家新创企业的数据。参考其他研究^[22],为了防止因异常值的存在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在回归分析前对研究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

2.2 模型设定

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根据数据特征和模型适用范围,选用二分类 logit 模型,并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text{Innov}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informal}_i + \alpha_2 \text{rent}_i + \alpha_3 \text{informal}_i \times \text{rent}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quad (1)$$

其中: innov_i 表示企业 i 的市场创新活动; informal_i 表示企业 i 面临的非正规部门竞争程度;

rent_i 表示企业 i 参与政治寻租的情况; X_i 为影响企业市场创新活动的控制变量集; $\text{informal}_i \times \text{rent}_i$ 表示非正规部门竞争与政治寻租的交互项,用于评估企业政治寻租对非正规部门竞争与企业市场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ϵ_i 表示随机扰动项。由于一些行业和城市的观测值个数太少(如皮革业仅有一个观测值,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仅有两个观测值,上海市仅三个观测值),因此参考相关研究^[19,23],本文未对所有城市和行业设置虚拟变量,而是在控制变量集中设置区域虚拟变量“East”和“Central”(West 为参照组)、行业虚拟变量“High”和“Medium”(Low 为参照组)以控制地区和行业差异的影响。城市的区域划分详见张璇等^[19]的研究,行业分类详见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制造业部门分类 (ISIC Revision 4)。

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 1 和表 2。

参照夏后学等^[6]的研究,因变量市场创新采用“是否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来刻画企业的市场创新活动。

自变量非正规部门竞争的测量方面,沿袭已有研究^[5,8,13]的思路,根据对“企业与非正规、未注册的企业存在竞争吗?”这一问题的回答设置虚拟变量,若企业回答为“是”,将其赋值为 1,若企业回答为“否”则将其赋值为 0。

自变量政治寻租的测量方面,参照现有研究^[6,19],根据对“当企业处理海关、税收、许可证、规章条例及相关服务等事务时,是否需要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以把‘事情办好’”的回答设置虚拟变量,如果回答为“是”,则认为企业参与了政治寻租, Rent 取值为 1,否则认为企业未参与政治寻租, Rent 取值为 0。

借鉴现有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5,6,8,19],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年龄,考虑到一家企业成立并注册于 2012 年,故用 2012 年减去企业正式注册时间然后加 1 并取其对数表征;②企业规模;③国有控股比例,之所以纳入此变量是因为一方面国有控股比例高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政府的庇护和政策性补贴^[19],因而可能在进行市场创新方面处于优势,而另一方面国有控股比例高的企业普遍面临缺乏市场活力的问题,官僚主义和激励机制的缺乏可能使得它们在开展市场创新活动方面动力不足^[24];④研发投入;⑤人力资本;⑥融资约束;⑦技术引进;⑧出口强度;⑨高管管理经验。有两家企业高管的管理经验不足 1 年,按 1 年计;⑩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强度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

的时间配置,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①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创新收益能否被有效保护,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动力^[5]。此外,如前所述,本文还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East* 和 *Central*)和行业虚拟变量(*High* 和 *Medium*),以控制它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	定义
市场创新	<i>Innov</i>	企业是否推出了新产品或服务(1 是,0 否)
非正规部门竞争	<i>Informal</i>	是否与非正规或未注册企业进行竞争(1 是,0 否)
政治寻租	<i>Rent</i>	当企业处理海关、税收、许可证、规章条例及相关服务等事务时,是否需要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以“把事情办好”(1 是,0 否)
企业年龄	<i>Age</i>	$\ln(2012 - \text{企业正式注册时间} + 1)$
企业规模	<i>Size</i>	$\ln(\text{企业员工人数})$
国有控股比例	<i>Government</i>	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占比
研发投入	<i>R & D</i>	是否有研发投入(1 是,0 否)
人力资本	<i>Human</i>	有技能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
融资约束	<i>Finance</i>	融资的可获得性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障碍(0 无障碍,1 微小障碍,2 中等障碍,3 较大障碍,4 严重障碍)
技术引进	<i>Technology</i>	是否使用外资授权的技术(1 是,0 否)
出口强度	<i>Export</i>	企业产品直接出口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高管管理经验	<i>Experience</i>	$\ln(\text{企业高管在该行业的从业年数})$
政府管制	<i>Regulations</i>	企业高管每周处理政府监管要求(例如因税收、清关、劳动力管制、登记注册等事项与官员打交道、填写文件表格等)所花费的时间比例(%)
法制环境	<i>Law</i>	法律体系是公平、公正、不腐败的(1 强烈不同意;2 不同意;3 同意;4 强烈同意)
东部	<i>East</i>	如果观测企业处于该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中部	<i>Central</i>	如果观测企业处于该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中高和高技术行业	<i>High</i>	如果观测企业处于该行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中等技术行业	<i>Medium</i>	如果观测企业处于该行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Innov</i>	554	0.406	0.492	1.000	0.000
<i>Informal</i>	554	0.475	0.500	1.000	0.000
<i>Rent</i>	554	0.045	0.208	1.000	0.000
<i>Age</i>	554	2.109	0.293	2.398	0.000
<i>Size</i>	554	4.209	1.181	10.309	1.609
<i>Government</i>	554	0.043	0.190	0.950	0.000
<i>R & D</i>	554	0.339	0.474	1.000	0.000
<i>Human</i>	554	0.352	0.219	0.959	0.000
<i>Finance</i>	554	0.740	0.821	4.000	0.000
<i>Technology</i>	554	0.224	0.417	1.000	0.000
<i>Export</i>	554	0.099	0.247	1.000	0.000
<i>Experience</i>	554	2.566	0.514	3.689	0.000
<i>Regulations</i>	554	1.130	2.885	35.000	0.000
<i>Law</i>	554	2.708	0.662	4.000	1.000
<i>East</i>	554	0.827	0.379	1.000	0.000
<i>Central</i>	554	0.132	0.339	1.000	0.000
<i>High</i>	554	0.359	0.480	1.000	0.000
<i>Medium</i>	554	0.227	0.420	1.000	0.000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非正规部门竞争、政治寻租及二者交互效应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作为对照,本文同时汇报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线性

概率模型(LPM)的估计结果。整体而言, p 、 R^2 、Pseudo R^2 及准确预测比率均显示有效,回归方程显著性较高,说明模型设定比较合理。具体来看,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遭受非正规部门竞争的新创企业实现市场创新的几率比是未遭受该

竞争的新创企业的 1.55 倍(即高出 55%);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政治寻租的新创企业实现市场创新的几率比是未参与寻租企业的 3.75 倍(即高出 275%)。非正规部门竞争与政治寻租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政治寻租未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由此可知,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而假设 3 未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国有控股比例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国有企业缺乏市场活力说”;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引进外资授权的技术有利于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活动,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此外,相较于低技术行业的新创企业,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行业的企业更可能实现市场创新。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LS(LPM)	Logit(系数)		Logit(几率比)	
	M ₁	M ₂	M ₃	M ₄	M ₅
<i>Informal</i>	0.074* (0.040)	0.426* (0.225)	0.438* (0.226)	1.532* (0.345)	1.549* (0.350)
<i>Rent</i>	0.256*** (0.093)	1.476*** (0.565)	1.322** (0.586)	4.376*** (2.446)	3.752** (2.275)
<i>Informal × Rent</i>			0.708 (1.103)		2.031 (2.351)
<i>Age</i>	0.079 (0.067)	0.398 (0.381)	0.408 (0.384)	1.488 (0.569)	1.504 (0.576)
<i>Size</i>	0.017 (0.017)	0.105 (0.099)	0.103 (0.098)	1.111 (0.111)	1.108 (0.110)
<i>Government</i>	-0.181* (0.105)	-2.160* (1.232)	-2.071* (1.097)	0.115** (0.125)	0.126* (0.134)
<i>R & D</i>	0.320*** (0.041)	1.548*** (0.222)	1.553*** (0.223)	4.701*** (1.041)	4.726*** (1.048)
<i>Human</i>	0.101 (0.088)	0.549 (0.511)	0.543 (0.513)	1.732 (0.869)	1.721 (0.865)
<i>Finance</i>	0.008 (0.024)	0.028 (0.138)	0.028 (0.138)	1.028 (0.138)	1.028 (0.138)
<i>Technology</i>	0.213*** (0.046)	1.116*** (0.268)	1.122*** (0.267)	3.053*** (0.782)	3.072*** (0.788)
<i>Export</i>	0.058 (0.077)	0.326 (0.437)	0.324 (0.439)	1.385 (0.603)	1.383 (0.603)
<i>Experience</i>	0.023 (0.039)	0.164 (0.224)	0.161 (0.224)	1.178 (0.261)	1.175 (0.260)
<i>Regulations</i>	0.012 (0.010)	0.083 (0.074)	0.081 (0.075)	1.087 (0.068)	1.084 (0.069)
<i>Law</i>	0.014 (0.029)	0.078 (0.161)	0.078 (0.162)	1.081 (0.179)	1.081 (0.179)
<i>East</i>	-0.131 (0.091)	-0.665 (0.540)	-0.693 (0.545)	0.514 (0.246)	0.500 (0.240)
<i>Central</i>	0.079 (0.103)	0.483 (0.599)	0.455 (0.603)	1.621 (0.889)	1.576 (0.866)
<i>High</i>	0.126*** (0.042)	0.752*** (0.243)	0.763*** (0.244)	2.121*** (0.523)	2.144*** (0.530)
<i>Medium</i>	0.130*** (0.047)	0.763*** (0.283)	0.782*** (0.288)	2.144*** (0.581)	2.186*** (0.596)
常数项	-0.158 (0.221)	-3.649*** (1.286)	-3.644*** (1.286)	0.026*** (0.033)	0.026*** (0.033)
<i>p</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R</i> ²	0.287				
Pseudo <i>R</i> ²		0.239	0.239	0.239	0.239
准确预测比率		74.19%	74.55%	74.19%	74.5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或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样本与统计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 4 M₆)与前文结果相一致。其次,我们将新创企业重新界定为生存年限小于等于 9 年的企业,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除交互项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外,其余实证结果(表 4 M₇)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虽然本文竭力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然而,由于问卷问题的有限性,还可能遗漏了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此外,政治寻租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这

是因为政治寻租可能影响企业创新,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也更有能力从事政治寻租活动。因此,借鉴 Fisman 和 Svensson^[25]的方法,使用同一城市的企业政治寻租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作为政治寻租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表 4(M₈)报告了使用 IV probit 得到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对外生性原假设的沃尔德检验结果显示可在 10%的水平上认为 *Rent* 为内生变量,因而工具变量回归是适合的。此外,弱工具变量检验(stata 命令为 weakiv)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相一致。综上可知,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M_6 (Probit)	M_7 (Logit)	M_8 (IV probit)
<i>Informal</i>	0.259** (0.132)	0.561** (0.248)	0.223* (0.132)
<i>Rent</i>	0.770** (0.343)	1.154* (0.700)	2.337*** (0.833)
<i>Informal</i> $\times$ <i>Rent</i>	0.416 (0.648)	2.203* (1.320)	-0.013 (0.3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2.127*** (0.745)	-4.378*** (1.514)	-2.386 (0.744)
p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0.069
样本量	554	451	554

3.3 进一步的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寻租未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新创企业政治寻租的重心并非寻求通过加快行政审批速度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是寻求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信贷支持。也就是说,非正规竞争导致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并非引致新创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什么因素是引诱新创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因素呢?为此,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26-27],选取非正规部门竞争、企业规模、国有控股比例、研发投入、融资约束、技术引进、税率约束(税率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障碍:0 无障碍,1 微小障碍,2 中等障碍,3 较大障碍,仅有 4 家企业认为税率给企业经营带来“严重障碍”,为了增强结论

的稳健性,将它们纳入“较大障碍”一组)、政府管制和法制环境作为潜在影响因素,并控制地区和行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由表 5 可知,非正规部门的竞争确实不是影响新创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因素,资金相关因素(包括研发投入引发的资金需求、融资约束引发的资金需求)、管制和法制因素、企业所有权因素是影响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因素,即有研发投入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国有控股比例越大(从而政企联系可能越多)的企业越可能参与政治寻租,而且,政府管制越强企业越可能参与政治寻租,法制环境越好,企业参与寻租的可能性则越小,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6-27]。综上可知,资金需求(包括为研发活动筹资、缓解融资约束)和躲避严苛繁琐的政府管制的需要是引诱新创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

表 5 新创企业政治寻租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Logit (系数)	Logit (几率比)	平均边际效应
<i>Informal</i>	0.835 (0.554)	2.305 (1.316)	0.028 (0.020)
<i>Size</i>	-0.312 (0.240)	0.732 (0.161)	-0.011 (0.008)
<i>Government</i>	2.473** (1.104)	11.857** (13.394)	0.084** (0.040)
<i>R&D</i>	1.183** (0.524)	3.266** (1.748)	0.040** (0.019)
<i>Finance</i>	0.594** (0.270)	1.811** (0.477)	0.020** (0.009)
<i>Technology</i>	-0.583 (0.718)	0.558 (0.374)	-0.020 (0.023)
<i>Tax</i>	0.244 (0.268)	1.276 (0.330)	0.008 (0.009)
<i>Regulations</i>	0.225*** (0.081)	1.252*** (0.093)	0.008*** (0.003)
<i>Law</i>	-1.108*** (0.402)	0.330*** (0.114)	-0.038*** (0.012)
<i>East</i>	-0.371 (1.354)	0.690 (0.795)	-0.013 (0.039)
<i>Central</i>	-1.681 (1.962)	0.186 (0.305)	-0.057 (0.056)
<i>High</i>	-0.771 (0.575)	0.463 (0.270)	-0.026 (0.020)
<i>Medium</i>	-0.048 (0.525)	0.953 (0.577)	-0.002 (0.021)
常数项	-0.664 (1.992)	0.515 (0.833)	
p	0.000	0.000	
Pseudo R^2	0.288	0.288	
样本量	553	553	553

注:平均边际效应报告的为 Delta-method 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 结论及启示

利用世界银行微观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及其交互效应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

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寻租未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非正规竞争并非引致新创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资金需求和躲避严苛繁琐的政府管

制的需要是引诱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恰当看待非正规部门和企业政治寻租现象及进行相关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对企业管理者的企业战略制定也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整体而言,政策制定者不必过分担忧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的负面影响,客观上,非正规部门的竞争有助于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由于非正规部门在短期内很难消除^[7],政策制定者应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非正规经济不等于地下经济或非法经济^[5],消除非正规经济是一个逐步的、长期的过程。未来要继续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减小企业进入正规部门的成本,与此同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坚决抵制非正规部门的“山寨”之风,逐步缩小非正规经济的规模。

其次,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理性基础,研究结论直击我国市场制度缺失所带来的“腐败悖论”,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寻租活动会代替市场机制,成为衡量企业研发能力的信号^[20],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金和政策牵引,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市场创新。为此,应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此同时,应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对政府部门公权力的监督,构建新型“亲”、“清”政企关系。

再次,鉴于资金需求、躲避严苛政府管制的需要是引诱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因素,政府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消除融资歧视,缓解新创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降低企业的“遵从成本”,消除企业政治寻租的动机。

最后,就新创企业管理者而言,即便政治寻租客观上促进了企业的市场创新,也不应寄希望于政治寻租,而应当依靠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做大做强,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陷入“中兴禁售事件”类似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 [1] 郝生宾,于渤,王瑜. 新创企业市场导向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J]. 管理科学, 2018, 31(5): 84-96.
- [2] 张峰,邱玮. 探索式和开发式市场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其平衡[J]. 管理科学, 2013, 26(1): 1-13.
- [3] PENG M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2-3): 251-267.
- [4]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J]. Research Policy, 1986, 15(6): 285-305.
- [5] 张峰,黄玖立,王睿. 政府管制、非正规部门与企业创新:来自制造业的实证依据[J]. 管理世界, 2016(2): 95-111.
- [6]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9, 54(4): 84-98.
- [7] 秦佳良,张玉臣. 非正规部门竞争下的企业创新研究[J]. 预测, 2018, 37(5): 8-14.
- [8] 温湖炜,孙淼林,周凤秀. 非正规部门竞争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19, 40(1): 105-112.
- [9] XIE X, QI G, ZHU K X. Corruption and new product innovation: examining firms' ethical dilemma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60: 107-125.
- [10] IRIYAMA A, KISHORE R, TALUKDAR D. Playing dirty or building capability? corruption and HR training as competitive actions to threats from informal and foreign firm rival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10): 2152-2173.
- [11] 蔡栋梁,李欣玲,李天舒. 政府补贴与寻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J]. 财经科学, 2018, 5: 105-118.
- [12] ROTHENBERG A D, GADUH A, BURGER N E, et al. Rethinking Indonesia's informal sector[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0: 96-113.
- [13] 何冰,刘钧霆. 非正规部门的竞争、营商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科学, 2018, 2: 115-128.
- [14] DISTINGUIN I, RUGEMINTWARI C, TACNENG R. Can informal firms hurt registered SMEs' access to credit? [J]World Development, 2016, 84: 18-40.
- [15] MCCANN B T, BAHL M.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from informal firms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 (7): 1518-1535.
- [16] PEREZ J A H, YANG X, BAI O, et al. How does competition by informal firms affect the innovation in formal firm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9, 49(2): 173-190.
- [17] 杨学儒,李新春,梁强,等. 平衡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一定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吗? [J]. 管理工程学报, 2011, 25(4): 17-25.
- [18] 李建标,梁馨月. 民营企业是为创新而寻租吗? ——基于税负的中介效应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6, 34(3): 453-461.
- [19] 张璇,刘贝贝,汪婷,等. 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经济研究, 2017, 52(5): 161-174.
- [20] 刘锦,王学军. 寻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30省12367家企业的证据[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10): 1509-1517.
- [21] LECHNER C, DOWLING M, WELPE I. Firm networks and firm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relational mix[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6, 21(4): 514-540.
- [22] 徐晨,孙元欣. 着眼长远还是急功近利:竞争压力下腐败对企业创新和寻租的影响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11): 129-143.
- [23] JENSEN M B, JOHNSON B, LORENZ E, et al. Forms

- of knowledge and modes of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07, 36(5):680-693.
- [24] JIAO H, KOO C K, CUI Y.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and firms' innovation in China: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ownership[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5, 96: 15-24.
- [25] FISMAN R, SVENSSON J.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1): 63-75.
- [26] PELIZZO R, ARARAL E, PAK A, et al. Determinants of briber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 [J].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6, 28 (2): 229-240.
- [27] WU X. Determinants of bribery in Asian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7(1): 75-88.

Competition from Informal Sectors, Political Rent-seeking and New Ventures' Market Innovation

Wang Xiaohong, Hu Shilei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Market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new ventures.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conomies, market innovation of new ventures is affected by many specific factor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from the informal sectors and firms' political rent-seeking on new ventures' market innovation by using the World Bank's China-Enterprise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informal sector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rent-seeking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new ventures' market innovation, but political rent-seeking doesn't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mpetition from informal sectors on firms' market innovation. The demand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aused by informal competition is not the main reason for new ventures' political rent-seeking, while the needs for capital and avoidance of harsh and tediou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new ventures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rent-seeking. Therefore, policymakers need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mpetition from informal sectors on new venture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informal economy gradually by promoting the convenience of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liminate firms' rent-seeking motiv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Keywords: informal sector; political rent-seeking; market innovation; new venture